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

——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张冰 范丽娜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

SPM

广东教育出版社

南方出版传媒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

——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张冰 范丽娜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 张冰，范丽娜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548-1636-3

I . ①从… II . ①张… ②范… III . ①汉字—书法—
鉴赏—中国—古代 IV . ①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5117 号

Cong Yahao Miwan Dao Liudong de Bowuguan : Zhongguo Gudai Shufa Jiancang Yu Jiaoyi

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赖晓华 刘 帅

责任技编：佟长缨 刘莉敏

装帧设计：张绮华

出版发行：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 址：<http://www.gjz.com>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印 刷：广州市金骏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广州市荔湾区芳村东沙大道翠园路 123 号沙洛工业区 C 栋一层）

开 本：278mm×1092mm 1/16

印 张：20.25 字 数：486 千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8.00 元

ISBN 978-7-5548-1636-3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邮箱：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020-87615809



戴鴻堂法書十

於林院國史編修刑部員外郎同董其昌等定

真賞之

示希臘

庚午正月三號

戴鴻



庚午正月三號

四言詩三首序
此錄其詩文多不可全載今名其
佳句而題之以古人新章之義其
卷之六

卷之六

自洪武二十八年歲次壬辰

不

無

全集



一个特殊领域的历史追寻

这是一部关于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史学专著，这是历史的描述，也是历史的追寻，而书法鉴藏与交易，又是一个较专门、较特殊的领域，所以，张冰、范丽娜二君的这一番历史追寻，至少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我跟着他们一段段地领略了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相关鉴藏与交易的事件、人物、藏品，以及相关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地域背景、家族背景和交游背景。我读到了他们的宏大叙事，也读到了他们的细微考辨，这不但使我更深入详实地了解了这个领域的历史，也让我看到了他们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以及对文献的精准利用。

所谓的宏观把握，是这部书通过纵向的梳理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并尝试把书法的鉴藏与交易及书法史叙述相结合，而不是让书法鉴藏与交易仅仅作为点缀依附于书法史的叙述中。从这种历史的追寻里，将书法鉴藏与交易这一板块的意义凸显出来，使我们认识到，有时往往是鉴藏影响了书法史的发展。

所谓对文献的精准利用，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艰难的资料整理，而有了一种研究思路的更新：亦即在注重鉴藏家个人情况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鉴藏圈子的整体活动及其社会效应，以反映出某一个阶段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基本状况。

这是一个历史的追寻，也是一个历史的叙述。述史固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的堆积绝不是历史，因为史料并不完整。特别是一些特殊的专门领域，比如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历史叙述。当然，“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是原则，但真这么做则有时无以述史。“述史”者，“述”为一回事，“史”为一回事。“述史”，既是“史料”的“史”，也是“述者”的“史”。历史实际上就是“述者（史家）”以其包括“史观”在内的“述史标准”、选择史料并把史料贯穿起来的过去的故事。所谓“过去”则有“时间”之义；“故事”是人的，自关乎“人类”。则历史应是在“时间”中的“人”的叙述。法国一个史学家说：“历史学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任何的历史都是人的故事，这部书法鉴藏与交易史，是特殊群体人的历史。我们在读这部历史的叙述时，就是在读这一群体人的故事。但是通常述史，总要

溯源，书法的鉴藏与交易是从何时起始的？所以就总要分析那源头，所谓“源”，有明的有暗的，“书写的”“艺术的”，是明的；“文化的”，是暗的。前者可以绍远而求之，后者可以就近而取之。通常绍远者多而取近者少，析“明”者多而掘“暗”者鲜。故吾常常伤探源之文字多“平面”而乏“立体”，也就是说文化的检讨不足。张、范二君这本书正是在文化的探讨上下了一番功夫的。

文化背景可以看作是一个“源”，可以把这个“源”加上引号。通常我们只把“文化”当作契机来说，而我看它应该是个“暗”的“源”，或者也可以说是“原因”，没有从这个“源”里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东西就成不了“势”。如果没有这个“源”，明里我们再绍远也没有多少意义。你说长江、黄河的那个源头意义在什么地方？如果成不了江河，它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么成了江河呢？它的意义就很大吗？也不是。它只是一个“可能”，而不是“能”，不是唯一的“源”。江河之所以有后来的江河之“势”，往往与那个最远的“源”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应关注其流变。张、范二君为他们的这部书取名“从雅好秘玩到流动的博物馆”，就标明这是一种历史流变的追寻。研究历史的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这种历史流变的追寻，应该是他们述史的一种指导思想。

但是“源”总是要探的，尽管“起源”的含义在史学研究中是较模糊的。“起源”意味着“开始”呢，还是指“原因”？这两种含义时常相互混淆。本书在探源时还是区分得较好。从史料上看，始于陈遵故事：

至迟在西汉后期，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鉴藏行为。当时有个陈遵（生卒年不详，官至京兆尹），“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有记述：“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这应该算得上比较典型的书法鉴藏行为。尽管羊欣所记或许略有夸张，然而也传达出一种观者为其书法所折服的信息。

同时，对“原因”的论述是这样的：

由于善书，一个人的信札能够引起关注，甚至争抢，应该说这种现象出现在西汉后期是得益于培养多年的重视书写的社会氛围，人们在重视书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书法审美鉴赏力，他们去争相收藏写得好看的尺牍，目的就是能够经常得到书写带来的美的享受。这也是书法鉴藏的基本功能之一。

探源，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以史料为依据，陈遵故事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开始”，但谁也不能说在陈遵之前就一定没有类似的事。没有史料并不等于没有史实，只可以说没有史实的记录。陈遵故事背后的是“社会氛围”文化背景的支持，这是陈遵书法之所以被收藏的“原因”，自然也可以当作“收藏”此一现象起始的原因。

述史最困难的事之一就是搜集必要的资料，在这一点上，我深知著者的艰难与认真。也如他们说的：

尽管鉴藏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多数所记录的情况非常模糊，且不同版本之间有所出入；尤其是在关于交易的记载中，信息不完整的现象屡屡出现；还有很多关键的收藏著录没有流传下来。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利用已有的文献进行适当的推测，对于偶然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很强的书法鉴藏与交易现象来说，这种推测的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

文献的征引、资料的考据，固然属于工具性的工作，工具固然不会产生科学，但一个尊重科学的社会却绝不应该忽视工具。考据往往源于对成说的怀疑，也往往出于对“常规方法”的怀疑。因为所谓“常规方法”或说是“常识”者，往往是把一时的观察所得拔高为永恒的真理。述“史事”而据此“常识”，往往说不通，或说走了样，因此才有了历史考据学的长足进步。本书著者正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考据，对固有的历史人物的描述做了更完整的考量，他们在“导论”部分述说其指导思想时就说过：

我们以往对书法史的研究太习惯于以书法家的视角来考察历

史上的名家……正是因为放大了书法家这一视角而容易忽略其他，诸如鉴藏家、文人士大夫身份等，而恰恰是这些视角对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至关重要。一方面由于书法对很多我们习惯性冠之以“书法家”之称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或者说揣测的那般重要。另一方面，这些“书法家”首先是人，其次是“文人”，他们面临着功名、政务、生活等，实如我们一样，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某一个角度对一个人进行有限的考量，充其量只是一个维度而已，而且，这一维度非常容易被我们无意识地放大。若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看，之前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将古人视为客观的故去之人来看，这就很容易导致思路狭窄、僵硬，所以研究成果往往刻板无味。如果我们能够将“书法家”作为栩栩如生的人来考察，尝试还原他的生活状态，这样的一种思路可能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效果。

述史，固然不能轻视考证，因为那样会使我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但考证毕竟是手段，不能把它当作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等于浪费时间。同时在叙述中亦显隔膜，有碍阅读，有碍传播。本书并无一味陷在无休止的考据之中，而是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有一种很好的整合之后的叙述。他们在谈到类似情况时说：

如何使这种历史叙述能够尽可能地呈现这一鲜活的过程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探索的系统工程。启功先生在谈到古代书画鉴藏理论的时候指出，中国古代书画鉴藏的记录到了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始创详细记录书画之体例，但只能记录法书的正文、题跋、印章及名画的款字、题跋、印章，至于法书的笔法、风格，名画的描绘技巧，书画的一切形状，都无法加以表达。文字描述的局限性是很大的，那么，如何利用现有的线索把相关的文献材料有机地组织到一起；更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是融合其他考察视

角的辅助以及合理的推断、想象来将历史叙述捏合成型并打通血脉便是一个巨大的课题了。

这正如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说的：“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做出数学似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但是，这部书“运用联想”而整合语词，并不在前一部分，尽管前一部分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这说明著者对史料的尊重；而是在后一部分，因为要融合相关学科的知识去复现鉴藏与交易的状况，这时候就有一些必要的“运用联想”的推断与想象，将文字描述的“缺席”尽量做到趋近于事件的还原。所以，本书自宋以后的叙述是十分精彩且非常丰富的。

以上是从大处的格局上说，若从细微的考辨与叙述上说亦有很多可圈点之处，择其一而说之，就是关于鉴藏史上“作伪”的论述。凡遇鉴藏，都有真伪辨析的问题。古来这类问题代代有之，是藏家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藏”的依据是“鉴”，“鉴”的对象是“真伪”和“优劣”。所以，述鉴藏史，是躲不过真伪鉴别问题的。本书摭拾各种文献中的实例，论列该详，同时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写得尤好：

伪作（包括代笔）主要以谋利为着眼点，很大程度上扰乱了艺术品市场，大量的古代文献记录了伪作风行的情状（尤其是明清时期），而如此大规模的伪作进入社会之后产生了怎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极少见诸文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具备鉴定能力的人是少数，因此大量伪作可以轻而易举地骗过毫不懂行的买者，以名家手迹的名头进入社会，这种现象无疑会放大某一位或某几位名家的传播效应，进而影响时人乃至后人的判断。甚至还有一些无中生有的伪作被假托名手掺入书法史之中。

唯所憾者，就是大藏家对藏品的鉴别过程的描述稍显不足，特别是他们在鉴别中的误读似亦应有专节细论。往往从他们的鉴审过程及他们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鉴定眼光和对真伪的辨别能力。“鉴审过程及论证过程”的资料非

常分散，但这方面的整理与描述却是不可或缺的，诚如著者所言：“人们在整理、鉴定、装裱等工作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鉴藏相关问题的研究也相应丰硕起来。由最初的藏品目录记载，发展到后来记录文字内容、形制、印记、题跋、流传以及藏家点评等内容的整体例，鉴藏成为一个包含观念、行为、方法等问题在内的专门学问，也是艺术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古代鉴藏家的经验总结的确不能满足于经验性的传承，更应要把它学问化，使其成为一种学理性的民族文化记忆。

写一部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史书，这是为特殊群体的人物立传，是对这一类事件的描述，是对这一块历史走势的追寻。著者述史的态度是诗意的，叙事语言也是诗意的，故不呆板，不隔。本书以特定的人物、事件为研究对象，能够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里的历史叙述，真是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我相信著者是带着感情去述史的，这非但无损于述史逻辑与史实考证的理智，反而更增其叙述的魅力，更利于传播效度。这也正与布洛赫的说法相合：“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失去诗意……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历史的叙述，往往以有最好的证据作“无懈可击”的叙述为理想，但实际情况又往往是“含混不清”的居多，所以，所谓“历史的叙述”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本书只是一个对书法鉴藏与交易史的建构式的努力，还有着更深入细致的充实之必要。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已经足可为人称道了。

王 强

2016年10月于北京

序
言

张冰博士和范丽娜博士是书法研究的后起之秀。张博士先后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从本科到博士都在研究书法，工作后成绩斐然；范博士则是哥伦比亚大学高才生，在艺术史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他们共同完成了这本著作后，希望我写一点学习体会，我是鉴藏史研究的外行，深感为难。但一则与张博士学缘甚深，二则与中央财经大学书法专业合作多年，因而不敢推辞，只好勉力应命。

近几年，书法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都在一个较为理想的方向上行进。书法史研究的进展尤其令人鼓舞，涌现了大批卓有创见的论著，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科研形态的建构，从作品到书家个案，从朝代到地域，从人物到制度，等等，都有相当出色的著作。在此基础上，书法史研究开始更加广阔地吸收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持续走向深化。

鉴藏史研究是深化的一个表征。鉴藏研究，使被研究对象从创造主体（书法家为中心）转向接受主体（收藏家为中心）。进入接受过程的作品和艺术家，才真正进入了书法史。因此，鉴藏史研究，可以追溯、重建书法承传的动态谱系，为我们展现一条波澜起伏而且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历史之河，揭示历代名家名作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阶段的升降沉浮，打破对于名家名作的僵化历史认知。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揭开交织在鉴藏过程中的身份地位、社会交往、利益交换等重要因素对于历史的潜在然而重要的作用，使书法史不仅仅停留在名家的成长、名作的创造等层面，而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书法史不再只是“书法”的历史，还可以是把握社会史的一个重要通道，书法研究由此获得了与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在同一平台上对话交流的可能。从项元汴、李日华，到徽商、盐商，再到各个时代书法鉴藏特点的挖掘，由点及面，这类研究正在形成当前书法史研究的一股潮流。可以说，这一领域（研究理路）已成为书法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高地（基本理路）。

由于时间的关系，目前相关书法鉴藏史的成果多见于个案和断代，通史则如凤毛麟角。两位博士有鉴于此，提出了这份研究成果，意图为我们勾勒古代书法鉴藏史的总体景观。从朦胧的鉴藏意识与行为的寻找，到逐渐完整的鉴藏体系与交易模式的总结，他们初步构建了关于书法鉴藏史的宏大叙事模型。同时，为了避免宏大叙事容易导致的空疏，作者采用了通史加专题的写作思路，选取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配合官私收藏与交易的梳理，这是十分明智的。

中央财经大学书法学科创建之初，就确定了与学校学科背景十分容易契合的发展方向，鉴藏研究是这一发展方向的基础之一。本书的完成，不论对当下的书法史研究，还是对该校书法学科的基础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文献材料庞杂，问题立体繁复，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尽管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避免不了疏漏。但从著作中已经反映出来的文献梳理、体系建构和问题研讨等基本功来看，这些疏漏将会成为他们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起点，也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完善。

是为序。

叶培贵

201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001 导论

第一章 亦公亦私的皇家书法鉴藏

- 009 西州草书热与书壁酬酒直：中国古代书法鉴藏的滥觞
- 013 魏晋南北朝
- 015 巧艺的尴尬
- 017 永嘉南渡中的文化转移
- 020 以二王为典型的东晋书法鉴藏
- 026 两次搜访天下：宋明帝与梁武帝
- 032 鉴定与装潢：内府书法整理工作的开端
- 036 书法之商品属性的初步显现
- 038 南北交流与藏品易主
- 041 隋炀帝的功与过

第二章 文化权威、政治手段与雅好秘玩

- 044 安史之乱前的鉴藏盛世
- 052 权贵阶层的雅玩
- 054 书法市场粗具雏形
- 057 内府法书复制之得与失
- 059 南唐三帝的书法鉴藏世界

第三章 文、商阶层的崛起与官私书法鉴藏格局的变化

- 067 一祖三宗的书法鉴藏
- 076 馆阁收藏制度与宫廷鉴赏活动
- 083 从王诜到贾似道：权贵高官的“巧取豪夺”
- 090 《书史》与《宝真斋法书赞》中的书法鉴藏圈
- 098 官鬻林立，行贩不绝：商品经济带动下的书法交易
- 105 金石鉴藏的滥觞
- 108 书法鉴藏之新门径：刻帖
- 110 文人士大夫的鉴藏观念：以苏轼、米芾为典型

城
真
堂
之
性
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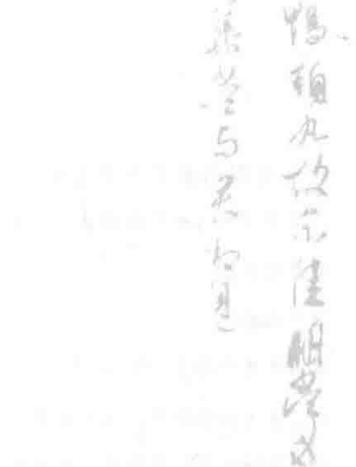
第五章 流动的博物馆

- 156 麋弱萧散——官方收藏的大量流失
- 159 巨眼辈出：私人书法鉴藏盛世的来临
- 176 “身份”与“人群”
- 195 海内奇观（图52）——空前兴盛的明代书法交易
- 213 书法鉴藏理论体系的建立
- 220 刻帖：私家书法鉴藏资源的整合



第六章 碑帖并进与书法鉴藏格局的丰富

- 225 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清代皇家书法鉴藏的由盛转衰
- 234 乾隆帝的鉴藏题识与印记——艺术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反映
- 240 北方鉴藏群体的崛起
- 254 幕府对访碑拓碑活动的推动
- 257 金石鉴藏的延展与深入
- 272 书法市场的博易万象
- 284 时愈近而价愈昂：“贵古贱今”思想的淡化
- 287 集帖、书法的对外输出
- 289 附录：清代私人丛、刻帖
- 294 结语
- 298 参考文献
- 310 后记



第四章 蒙汉文化调和中的书法鉴藏

- 115 从秘书监到奎章阁——元代内府鉴藏之兴衰
- 133 多重的身份与书法鉴藏圈
- 147 名家鬻书与艺术赞助
- 151 雅集：元代书法鉴藏的重要景观

导论

关于中国书法的艺术自觉问题，目前学界仍无定论。言自甲骨时代者有之，言自两汉者有之，言自魏晋者亦有之。诸说之中，似乎从魏晋者更多，这应该是结合其他文艺门类的自觉进行考量的结果。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划清界限的论题，一种艺术的自觉必定是先从少数人开始，逐渐蔓延到多数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因而，我们也无须纠缠于此。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艺术自觉意识开始出现的时候，对艺术美的追求意识会随之出现，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赏”。这种“赏”往往伴随着“把玩”，进而出现“藏”的占有行为。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眼力的提高和欣赏视阈的拓宽，“赏玩”往往会以“鉴”为保证。“鉴”又分为优劣和真伪两个层面，真品未必然优，伪者亦未必劣。鉴藏行为出现的早期，人们获取心仪藏品的途径基本是以物易物，或为生活用品，或为艺术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日常的艺术品交易逐渐发展为以金钱为媒介，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大量的艺术品交易行为。

具体而言，艺术品鉴藏是由赏、鉴、藏、流通组合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流通行为是鉴藏发展成熟之后的结果，鉴为基础，藏为手段，流通进一步拓宽了艺术品的社会功能，这三种行为的前提是赏玩，目的也多是赏玩，即满足欣赏者或收藏者的审美需求。书法鉴藏乃是以鉴藏行为为途径，让书法在更多层面上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也是社会性反映于书法之上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书法得以传承几千年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其紧密切合社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

本书要描述的是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的发展状况，以时间照量的话，约略自汉魏时期书法鉴藏行为的出现，直至清代书法鉴藏、交易行为的高度成熟与普及。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的社会功能逐步丰富并且深化的过程，亦可理解为中国书法艺术之魅力由小众渗透向大众的传播过程。

本书论述的核心是书法。张彦远有云：“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书即约字以言价，画则无涯以定名。况汉魏三国名踪已绝于代，今人贵耳贱目，罕能详鉴。若传授不昧，其物犹存，则为有国有家之重宝。晋之顾、宋之陆、梁之张，首尾

完全，为希代之珍，皆不可论价。如其偶获方寸，便可缄持。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钟、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于画，自古而然。”^[1]这一段广为引征的书画道殊论将书法与绘画在创作过程、鉴藏论价等方面的区别辨析得非常清楚。客观地说，书与画是两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又属于两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二者有很多共通点。书法与绘画从艺术追求的终极意境上是相通的，也都是古代文人士大夫颐养情性、高标意韵乃至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历史上有很多名家是能书善画的。若从文化史的视角来考察，将书、画作为一个整体视为中国文人艺术的表征，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研究是合理的。然而，若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而言，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到书与画的区别，以便更好地突出各自的特性及发展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可见的相关鉴藏史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兼论书画，书画不分家似乎是自古以来研究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视角。此外，大量的文献并没有将书画离析清楚，很多都是笼统发论，这给分类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目前关于书法鉴藏的研究成果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少。对于起步较晚的书法学科来说，很多研究者的视阈和精力多集中在传统意义上的书法史论研究或书写技法理论研究方面，对书法鉴藏问题只是泛泛了解而未及深入。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传统史学之影响与书法学科的主流研究方向两方面之制约有关。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的研究成果中相关古代书法鉴藏史较多的是老一辈鉴定家如启功、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先生的相关论著，多为具体的鉴定文章或鉴定经验的论述。虽字字珠玑，然其重心并不在书法鉴藏史相关问题的讨论上。所以，相关研究成果“少”的背后是书法鉴藏史研究的尴尬，一般的书法学科并不会将其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加大投入，专业研究书画鉴定的学者又多关注于具体作品的鉴定，在他们看来，书法鉴藏史应该属于书法史论研究的范畴。因而，在这种“推让”之下，书法鉴藏史研究迟迟没有引起书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二是散。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开始涉足中国古代艺术鉴藏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较早的有傅申的《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高居翰的《画家生涯——传

[1] 张彦远：《论名价品第》《历代名画记》，卢辅圣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27页。